



“桥见海河”系列文创印章
图片由被采访人提供

【观点追踪】海河蜿蜒，载着两岸烟火气缓缓流淌，河面上的一座座桥梁，便是这座城最沉稳的注脚。从可开合的解放桥到化身“天津之眼”的永乐桥，从如彩虹卧波的金钢桥到浸满欧风的大光明桥，每一座桥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承载着一代代天津人对家乡的绵长情愫。

近年来，这些沉默的桥梁悄然从河上“走”下来，变成印章上的线条、明信片里的风景、冰箱贴上的念想，更走进了不少外地游客的心里。前不久，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推出“桥见海河”系列文创产品，其中31座桥梁艺术印章尤为引人注目。方寸之间，天津桥梁的风姿跃然纸上，更引得无数市民游客慕名而来，以集章之名，赴一场与城市地标的深情邂逅。

“天津不养闲桥”这句带着自豪的调侃里，藏着天津人对桥的偏爱，更是这些桥的文化成长动力。在一次次文化创新与突破中，我们清晰看见：天津的桥梁正从单纯的建筑地标，成长为丰满立体的文化符号，让更多人透过桥梁，读懂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深厚底蕴。

流淌岁月里的城市根脉

天津因河而兴，河网如血脉交织，造就了这座城与桥解不开的缘分。“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这句老话道尽了河、桥与天津的紧密关联——河多则桥密，桥密则城兴。早年，河流曾是真切的阻隔，摆渡便成了两岸往来的主要方式。寇家口渡口、小刘庄渡口等知名码头，木船摇摇晃晃间连通两岸烟火。据老一辈回忆，父辈年轻时乘摆渡，人过河只需一分钱，推车则再加一分，十来分钟的航程，时光慢得格外实在。

摆渡之外，天津的桥梁史早已悄然铺展，更成为解读津派文化的关键密码。正如津派文化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天津师范大学谭汝为教授所言，探究天津方言文化、地名文化与民俗文化，始终离不开对河流史与桥梁史的深度挖掘。

天津河道上的浮桥，远比世人想象中出现得更早。史料记载，天津最早的浮桥可追溯至清朝，以木船并排相连、上铺木板而成，尽显天

桥见天津：海河之上 符号生长

记者 田莹 摄影 胡凌云

津人的活泛智慧——遇大潮通行便拆开几节，船过再合拢铺板，巧妙化解水陆交通的矛盾。当时，钞关浮桥（又称北浮桥，位于北大关）、盐关浮桥（亦称东浮桥，今金汤桥附近）、西沽浮桥等星罗棋布，日复一日承载着南来北往的商旅与两岸居民。这艘舟桥往来、人声鼎沸的盛景，被郑重载入《天津县志》，成为清代“天津八景”的“浮梁驰渡”，定格了老天津的水运繁华。

天津城市现代化的脚步，在桥梁上留下了深刻烙印。开埠以后，西方开启式铁桥技术传入，让天津的桥梁迎来全新模样。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天津的开合桥》中写道：“几乎全国的开合桥都集中在天津，这不能不算是天津的一种‘特产’。”此言不虚，可竖向开启的解放桥、可平面旋转的金汤桥，皆是为兼顾车马通行与大型船舶通航而生。这些“能动”的桥梁，是天津作为北方水陆码头的独特产物，铜骨转动间，既见证了近代工业的兴起，更藏着中西文化交融的鲜明痕迹。

有些桥，早已超越建筑本身，化作这片土地的名字。谭汝为教授讲过一个生动的故事：1887年，北运河与子牙河交汇处原有一座木拱桥，后改建为铁桥，桥身弯弯如彩虹落地，被百姓亲切称为“虹桥”。久而久之，“虹桥”成了地名，最终更成了行政区名——红桥区。一座桥，就这样把自己写进城市地图，也写进世世代代的生活里。类似的故事在天津还有许多，诸多带“桥”字的地名，都在默默诉说过往：哪里曾有一座桥，桥边曾有怎样的烟火人间。

于天津人而言，桥从不是冰冷的建筑，而是贴着生活体温的老伙计，是情感的容器。桥墩下总有垂钓的老翁，桥头常有静待晚霞的情侣。在谭汝为看来，天津人开朗、豁达、见面熟的性格，皆与这河、这桥密不可分。河流曾是阻隔，天津人却用摆渡、浮桥、铁桥一次次跨越，这份务实、乐于且善于“打通”与“连接”的智慧，渐渐融入城市血脉，铸就了开放、包容、流动、不僵滞的城市品格。

进入新世纪，海河历经精心整治，老桥被悉心修缮，新桥携设计巧思加入。如今的海河，平均不到一公里便有一座桥，更达成“一桥一景”的景致。白昼里，桥梁各展形制气度；夜幕降临，灯光点亮，整条海河便化作流动的光带。桥为海河注入活力，使蜿蜒流淌的海河，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动脉兼文化景观带，成为海河韵味醇厚的文化符号。

让桥景变风景更成心境

桥与风景，早已在海河两岸静静矗立。但如何让风景不止于眼底的惊艳，更化作心底的铭记？这些年，天津以扎根文化、贴近生活的

探索，给出了温暖而有力的答案。

诸多尝试中，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推出的“桥见海河”系列文创活动尤为动人，尤其是那一枚枚精心刻制的桥主题艺术印章，藏着最质朴深沉的文化心意。“我们的初衷很纯粹，”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活动负责人付海芬坦言，“从没想过要做商业爆款，只是觉得这些桥承载了太多故事，不该只沉默地立于水中。我们想以艺术为媒，搭一座无形的桥，让桥梁故事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为了这份纯粹的初心，馆内三位美术干部耗费三年光阴，以脚步丈量海河，用笔墨为桥梁立传。他们以三岔河口的永乐桥为起点，沿蜿蜒海河一路采风至入海口的南疆公路大桥，将31座桥梁的风姿逐一定格在写生稿中。这绝非简单的临摹复刻，每一笔都藏着对细节的极致较真，既要守住历史的精度，亦要兼顾艺术的美感。

参与创作的美术干部姚铸说，每一枚印章都是桥梁的“微缩档案”，必须找到最能彰显其特色的角度。比如狮子林桥，桥身姿态各异的狮子是其灵魂，设计时便特意突出这一标志元素；而每枚印章下方的简要文字，既介绍桥梁的历史背景，又点明其功能价值，让印章既有“形”，更有“魂”，串联起“一桥一故事”的城市文化长卷。市民赵瑜的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把天津的桥做成这样一套文创，真是说到了我心坎里。收集它们，就像在收集这座城市的一段段记忆。”

与文创印章同步登场的，还有“这里是天津”城市主题美术摄影展。天津市群众艺术馆举办以“海河上的桥”为核心命题主题的展览，成为市民寄托家乡情愫的载体。大家纷纷拿起画笔、举起相机，将对桥的眷恋、对城的热爱倾注于作品之中，短短时间便征集到700多组投稿。水彩的温润、国画的写意、摄影的写实，每一种艺术形式都藏着对桥的独特解读。60组精选佳作不仅线下陈列，更化作精致明信片，让海河桥的风姿随笔墨流转四方。这份热爱更蔓延至线上，小红书“桥见海河”话题下，满是网友的打卡分享，不少外地游客循着热度专程而来，只为亲手集齐31枚印章；冰箱贴、钥匙扣等小巧文创，则让厚重的桥梁文化卸下铠甲，以轻盈姿态融入日常。

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主任张旺评价：“这组印章最可贵的是‘系统性’。它把散落的珍珠串成了项链，让人们清晰地看到天津桥文化的整体脉络。”

天津对桥梁文化的梳理与激活，更延伸到对海河沿线资源的全方位整合提升。2025年，天津实施“一桥一景”灯光提升工程，通过对每座桥的材质、色彩、结构进行光谱分析，定制专属“光配力”，引发社交媒体百万级关注，让海



狮子林桥海鸟翩跹



夕阳下的永乐桥



解放桥在夜色中开启

河桥梁成为城市夜景的核心轴线。

水岸游览体验同步升级，河上游船化作流动的观景台，一张船票便能串联起217栋建筑、14座桥梁与8座码头，将“天津之眼”的浪漫、古文化街的古朴、意风区的典雅尽收眼底。2025年升级后的8.2公里光影带，以“城市光脉”为核心理念，打造“津眼秀”“津桥秀”“津门秀”三大地标秀场，夜游时两岸灯光与游船上的曲艺相声相映成趣，满是浓郁津味。

最动人的，莫过于桥边的歌声与欢笑。自2024年推出以来，“桥见海河·邂逅浪漫”桥边音乐汇已举办百场演出，累计吸引400余万人次观看。交响乐、民乐、京剧、芭蕾舞等艺术走出殿堂，在古文化街、津湾广场等亲水平台上演，成就艺术与生活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海河龙舟赛、天津国际马拉松赛等体育赛事，也纷纷以桥梁及河岸为背景或赛道，尝试将文体活动与城市景观、商业休闲深度融合，探索“农文体商旅”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从文创产品的精心打磨，到光影工程的匠心营造，从水岸游览线路的串联，到公共文化活动的植入，天津正多维度挖掘海河与桥梁的文化、景观价值，让其渐渐融入城市日常节奏与公众生活体验，让桥景真正变成风景，更化作藏在心底的城市记忆。

为复杂的历史性问题，有时你费心费力去求证的事，传承人却并不认可，这也令人很无奈。

在申报过程中，很多传承人比较务实，会做不会说，那么申报文本的完成过程就会很繁杂，要根据申报人的口述来科学地推测和复原历史，同时，我们要查阅大量文献、寻找佐证材料，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撰写材料。撰写申报文本最忌讳加入凭空想象及杜撰，要聆听、要调查，不要肆意引导。我始终坚持出自我手的申报文本就是还原历史的文字记录，而不是一个剧本。

记者：您认为当前非遗传承面临的瓶颈是什么？对于年轻一代参与非遗传承，您有哪些期待或建议？

杨波：瓶颈是相对而言的。那些历来优秀的、传承有序的项目，只是在与过去的比较中，统计数据上出现了变化，而另一些非遗项目，瓶颈是期望值过高造成的。这里有从盲目喷发到良性循环的降热因素。

纵观当今，从各级文旅部门，到村居社区，对于非遗传承保护的意识和行动都在提高和加强，几乎到了人人知非遗的地步。所以我认为所谓的瓶颈并非指项目已到濒危地步，它的“貌似衰落”是传承端出现一定的问题，也就是说自身结构出了问题，那些自身素养较差、为了申报而申报的传承人势必会面临今天的态势。

再有，有些项目传承人老龄化且无人继承，我们说这不是项目本身的问题，而是传承方式过于保守。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非遗保护工作，从追求数量和效率转向追求质量，这必然会淘汰鱼目混珠者。传承人的素养和态度，直接决定了非遗传承的成效。以北辰区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刘园祥音法鼓为例，年轻的继承者数量一度减少，主要传承人及时研究问题所在，改变传承方式，核心内容上该守的死守，可改的必改，适合年轻人的就大胆尝试，目前传承队伍相对稳定。

我们总是把目光聚集在年轻人本身，而忽略了影响年轻人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年轻人的父母。非遗传承群体缺少年轻人，而这个阻力有一大部分是来自年轻人的父母。我们常开玩笑说，你说服了“80后”，也就说服了祖孙三代人，因为方向盘在他们手中。

非遗要有意义，更要有意思

记者：成立“展文故里非遗传承文化促进中心”的初衷是什么？如何通过社团力量助力传承人提升生存与发展能力？

杨波：在2017年前后，北辰区在申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前期，看准了把民间非遗

桥梁进阶与城市叙事新篇

天津对桥梁文旅价值的挖掘，已然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然而，文化IP（知识产权）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生长。如何让这份桥畔魅力不断焕新，突破同质化开发的局限？在与多位专家的交流中，一条更为丰富的进阶之路逐渐清晰。

“天津的桥，早已不是单纯的交通设施。”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于海波在采访中一语点破，“要实现从地标到文化符号的跃迁，核心是要完成连接方式的升级，即从‘功能连接’转向‘情感连接’与‘体验连接’。”在她看来，这绝非表面包装，而是深度的价值重塑：“它需要的不仅是对历史的挖掘，更需要适当的建设、创意、科技与艺术创新去重新演绎天津桥梁文化的史诗，让本地人感到自豪，让游客心生向往。”她描绘的未来图景令人向往：“当每一座桥都成为可阅读、可体验、可分享的文化纽带时，整条海河将真正流动为一座文化长廊。”

张旺则从实操层面提出了具体构想。“桥梁IP的塑造，离不开其承载的历史与集体记忆。”他建议，在桥梁上增设二维码，让游客扫码即可获取建筑数据、历史图文及口述记录，使每座桥都成为一本“可读之书”，“这不仅能提升游览深度，更能后续文创开发积累鲜活素材”。于海波也建议将海河桥梁串联成完整的文化故事线，搭配“桥梁护照”等衍生产品，让游览变成一场充满探索乐趣的文化游戏。

谈及文创开发，张旺认为当前产品可以更具互动性：“比如设计榫卯结构的桥梁拼装玩具，让孩子们在动手搭建中了解桥梁构造；或者打造数字藏品，让文化传承搭上科技快车。”他强调，将桥梁元素融入日常用品，让“桥记忆”自然走进生活，才能避免文创产品被“束之高阁”。

对于桥梁空间的充分利用，于海波给出了极具突破性的思路，她强调：“我们不能只盯着‘桥上’那一小块地方，桥梁文旅的魅力，藏在‘桥的周身’每一个角落。”在她看来，桥梁从来不止是通行路径，“其本身及周边空间，都是独一无二的体验场域”。她建议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像巴黎塞纳河畔、伦敦桥那样，让桥与周边环境深度融合。我们可以规划‘水、陆、空’三维观桥线路，把桥畔漫步道、桥上骑行线，甚至空中航拍打卡点串起来，让游客从不同角度感受桥与海河的共鸣。”

于海波进一步指出，桥下、桥侧这些所谓的“灰色空间”，也是待挖掘的宝藏。她举例道：“比如在解放桥旁设置合机械互动区，让游客能直观感受工业遗产的机械魅力；把部分桥下空间改造为微型桥梁博物馆，陈列老桥构件、建设图纸和市民捐赠的民间记忆藏品，让这里满是历史温度；还可以在永乐桥、北安桥等热门点位，打造桥主题的精品咖啡馆、艺术画廊，让桥梁不再只是匆匆路过的景观地，而是能让人驻足停留的社交休闲聚集地。”她甚至畅想了更具人文关怀的场景：“我们还能在特定桥梁旁打造专属的求婚、纪念日仪式区，让这些承载城市记忆的桥梁，也成为承载个人重要时刻的舞台。”

未来，若每一座桥都能成为可读、可感、可参与的文化节点，若整条海河真正成为流动的城市文化体验带，那么天津的桥梁故事，将不仅是一份答卷，更是一部持续生长的城市史诗。这是桥的第二次生命，也是一座城市通过文化进行的深情书写——用今天的方式，记录昨天的故事，留给明天的记忆。

非遗新传

杨波 三十余载“寻遗”路

记者 郭晓莹

杨波，天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辰区“展文故里非遗传承文化促进中心”的理事长。作为一位资深的“非遗人”，他深入挖掘非遗的“寻遗”经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早在1992年，北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杨波被推举为文联下属的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会长，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关注和挖掘非遗。只是，那时候非遗这个名词还未出现，传承人们还都被称为民间文艺家或民间艺人。就在这样的契机之下，杨波开始系统性挖掘北辰区的非遗技艺，参与了很多非遗技艺的申报工作。



杨波

到了深入挖掘与系统梳理阶段，困难就来了。首先在项目认定上，科学的归类本身需要一个认知和摸索的过程。早期，一些本应属于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类别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就曾被列入传统技艺中。

再有对于项目谱系的梳理，乡村里宗族观念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群体项目虽然表面上看似是属于某个村子的，但是其历史渊源很可能是某个家族或多个家族创办的，那么在传承谱系和传承人的认定上就要经过认真、反复的田野调查，有时为了实事求是地认定，会惹来很多争议。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有深厚的民间文艺知识、史志常识，又要熟悉农村习俗，从而去伪存真，做到公平公正。

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申报，需要阐述项目的名称、地理位置、分布范围、历史沿革、基本内容、实践方式、实践主体、主要特征、文化意义、社会功能等要素。这实际上是在综合评价一个“非遗现象”在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价值，同时一个硬性条件就是该项目传承的历史应至少追溯至百年或传承三代以上。这也是我评判项目的核心标准。此外，研究“非遗现象”，一定要看该项目对相关区域和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价值和影响。

规范申报是科学保护的开始

记者：非遗申报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在协助传承人申报非遗的过程中，您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您如何帮助他们梳理脉络、准备材料？

杨波：有人说，一个现象只要它符合非遗申报的条件，就应该即刻被认定，因为如果申报过程过长，这个现象就有可能消失。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申报这个过程。因为通过申报，可以优化筛选，可以达到规范项目的目的，还能够通过统筹资源来加强项目的长效保护。如果你感觉这个现象或项目在等待申报的过程中会消亡，那就先及时地抢救、记录，留下文化基因。两者并不矛盾。

我协助传承人进行非遗申报实则是无奈之举。在从事相关工作最初的那几年，我所接触到的传承人，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阅读和理解能力以及动笔总结能力差，反观青年人又很难系统性把项目的基本内容和文化价值阐述清楚。况且申报所需拍摄的纪录片又有一定的镜头语言和技术展示要求。在这些硬性要求下，传承人不得不求助外界帮助。

非遗工作开展伊始，很多文化部门的干部都是主动肩负起帮助传承人申报的工作，即使纷繁复杂也任劳任怨。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很多环境、条件以及工作理念从内到外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但很多传承人，尤其是一些乡村群体项目传承人和老年手工艺者，依然无法独立完成申报，因此协助申报工作依然存在。

每一次协助申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历练过程。有时为了一个佐证，我会驱车百里采访调研。在协助某个项目申报时，偶然得知其创始人的后代还在，我会费尽周折亲自找到本人了解历史情况。很多非遗的研究需要涉及较

一辆自行车、一支笔、一个本子的“下乡”之路

记者：在早期走访中，有哪些非遗项目或传承人的故事最令您触动？请您分享一下当年难忘的“寻遗”经历？

杨波：早期的田野调查叫作“下乡”，现在看来那其实就是“寻遗”。那些年就是带一辆自行车、一支笔、一个本子，没有任何录制设备，我能做的只是用文字来记录和描述那些民间技艺与民间艺人。

那时，这些民间艺人和民间技艺并不像现在这样被全社会高度重视。还记得我进村到剪纸老艺人家中采访，那时的乡村是贫穷的，但是老艺人的豁达、沉稳与那份朴实令人记忆犹新。有一次为了一个线索，我从北辰区一路骑着自行车到了蓟县（现更名为蓟州）。为了收集北运河上的“号子”（小调），我坐在吊桥边的树荫下，听老人凭记忆哼唱“号子”，看他们表演运河纤夫当年拉纤的动作。这个过程是艰难的，要费尽周折才能找到一两个愿意和你沟通的老人。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安逸，到处都能看到相聚在一起的老人。但他们一旦打开了话匣子，眼睛就亮了，仿佛又回到了追着纤夫听他们唱小调的童年。可惜，没有录制设备，我又不是音乐专业，太多的内容只是过了耳瘾，那些记录也都随着生活的变迁而消失了。

记者：对于北辰区的非遗，您当年是如何开展摸底与挖掘的？遇到过哪些困难？在您看来，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具备非遗价值，核心标准是什么？

杨波：我的初期摸底与挖掘工作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但那时可以说是民间个体行为。北辰区非遗工作系统性梳理和挖掘应该是区文化部门于2003年左右开始的，至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首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这段时间应该是北辰区非遗系统性梳理、挖掘、建档的核心标志性阶段。

北辰区历来重视群众文化工作，因此保存了许多传承已久的民间艺术形式。尤其是北辰区民间艺术研究会改为北辰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后，我更有意识地系统开展建档工作，对会员的技艺进行整理归档。这使得许多民间文艺现象，顺理成章地转化为非遗工作目标。

现在看来，起始阶段还是比较顺利的，但